

杨公骥教授

——一位始终不渝追求真理的学者

杨树增

提 要 杨公骥生于国难时期,青少年时就奔赴延安寻求救国真理。后来成为中国当代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在文学、史学、哲学诸人文社会学科,尤其在中国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用他的人格与学养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学生。他的鲜明特点,就是能以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研究与教学,见解卓异,成绩斐然。

关键词 杨公骥 战士 学者 教育家

杨公骥在青少年时就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中,1937年秋,在湖北武昌中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1938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曾在安吴青训班、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生产、战斗过。在陕甘宁边区七年半中,他经受了锻炼,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抗日胜利后,在晋察冀边区从事过短暂的工人运动。1946年冬,不足26岁的杨公骥进入东北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史和中国古代史,成为东北大学、东北师大创始人之一。1952年31岁时被任命为国家研究生导师,1981年被国务院任命为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在国务院第一届学位委员会评议组中,他为仅有的四名文科成员之一。还在国家、省级多种学术组织里兼职,如中国文联全国委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吉林省社科联副主席等。他几乎一生从教,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几十年来,他在多个学科领域取得了创新性成果,其成名之作则是《中国文学》(第一分册)。他的著述不仅包含文学与史学,还涉及到哲学、政治学、美学、民俗学、训诂学、古文字学、敦煌学等学科。他主张科研成果求质不求量,所以从不率而成篇,每有论作,必有新见。一家报纸评述说:“在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杨先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取得了多方面的、创造性的成果,特别是在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方面,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研究道路,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被称为‘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第一人’。”^①

一 抗日救亡的革命者

杨公骥生于河北正定,正定城在历史上曾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城内名胜

^① 《新文化报》2001年7月22日。

古迹众多,名家代不乏人,有着灿烂丰富的燕赵文化遗迹,本身就是一本读不完的文化“大书”。杨公骥从幼年到少年,在这个环境中耳濡目染,沐浴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阳光雨露。

他的母亲因生他难产而死,父亲是位军人,常年不在家,他的“早期教育”是由爷爷完成的。他的爷爷是正定的“小神童”,15岁中秀才,因为清朝废了科举制,才没再考举人,因家境富裕,就耽于读书。他厌恶文人以文谋取名利,曾在孙子的砚台背面镌刻八句铭文:“无知寡识,盲瞽一生。广知多识,耳聪目明。人生一世,贵在博通,以学射利,市井之行。”这八句铭文,也镌刻在了杨公骥的心上,一生一世未尝忘记。祖父给孙子遴选的书籍很杂,有常见的经史子集,也有野史笔记,他主张“开卷有益”,不限制孙子的阅读范围。杨公骥越读越有乐趣,渐渐养成了一种读书习惯,知识储备之多,显得与他年龄很不相称。

家人中对杨公骥影响较大的还有他的小叔叔,在他六七岁时,小叔叔考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从小叔叔经常带回家来的共产党的刊物和进步的书籍,可以猜测到:小叔叔一定是参与了共产党的活动。杨公骥12岁时,小叔叔因“肺病”去世,他曾翻看小叔叔留下的书籍和刊物,其中就有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和由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先后任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机关报《向导》,及当时许多进步作家的书籍,如鲁迅的著作。

杨公骥6岁时被送到正定城的八师附小读书,他性格活泼,记忆力超出平常的孩子,考试成绩从来是名列前茅,张同人老师非常喜欢他,开始指导他阅读鲁迅的著作。杨公骥一接触鲁迅的作品,立刻被深深地震撼,为鲁迅的精神和品格所倾倒。鲁迅是他一生中最敬仰的伟大作家之一。

由于成绩特别优秀,他连跳二级,考入河北省立正定中学(原为直隶省立第七中学)。正定中学是石家庄地区第一个建立中共支部的,早在1924年,受李大钊派遣,共产党员张兆丰、郝久亭在正定中学就发展了5名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12”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但杨公骥常猜测哪些老师或高年级学生是共产党,他觉得凡是爱国、不怕牺牲、主持公道、乐于帮助穷人的,就很可能是共产党。

1933年,爷爷去世后,杨公骥就遵从父命转学到南方,那时他才12岁。初入湖南长沙复初中学,后转育才中学。1935年冬,迁入江苏盐城中学,1937年秋,跳级考入湖北武昌中华大学。离开家乡在新的环境里,他仍保持着大量地阅读课外书籍的习惯,曾阅读过有关天文、历史、经济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民俗学、考古学、语言学的许多著作或译文。还经常参加校外的抗日宣传活动,蹲过警察局的“班房”,每个假期到各地进行社会调查,所以他的眼界开阔,知识与见识在同学中属出类拔萃者。

这个时期他总结了自己的“扫外围”读书法,200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家读书百法》的书,介绍了古今中外一百位名家的读书方法,其中就有杨公骥的这种“扫清外围法”。杨公骥自己说:“学习研究犹如攻坚:攻坚城必须扫清外围,因为坚城与外围工事乃一整体,后者不破,前者难拨;学这一学科也必须兼通相邻学科,因为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孤立发展、独立存在,都与其它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对后者不通晓,

对前者难精通。”^①例如,当时史学界正在争论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说法不一,犹如聚讼。他阅读了各方的文章,对他们的论据及论证,一开始懵然不懂。为此他就采用“追踪求索扫外围法”,大量地阅读“金甲文”、“殷墟报告书”、“古代社会”、考古学、经济学、希腊史、“卡尔·马学说”等有关文章。阅读范围越来越广,知识面也越来越宽,给他奠定了理解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脉络的知识基础,而“卡尔·马学说”给了他判断中国古代历史阶段划分的钥匙。

这个时期,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全面侵华的时期,日寇步步紧逼,向中国的内地大城市发起进攻,妄图占据整个中国。新思想观念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初步了解,使杨公骥渴望寻找一条解救中华民族的道路。“七·七事变”后,中华大学奉令疏散,先西迁湖北宜昌小溪塔,又迁到重庆市南崖米市街。杨公骥听从父亲的意见,到了甘肃天水。天水没有高校,1938年春,父亲让他到天水国立中学重读高三,准备把他送到欧洲去留学。在学校里,他认识了几个逃亡来此读书的同学,他们是汪志天、刘克明、胡维翰,都是“民先”队员。他们几个商定:奔赴延安,加入共产党,参加八路军,抗击日寇救中国!6月的一天,杨公骥等五个青年带着“民先”的介绍信,从天水出发了。

父亲闻讯后,一直追至西安,极力劝说儿子回去,并说在瑞士的银行里存了一笔钱,劝儿子还是选择到国外去读书。杨公骥断然拒绝了父亲的请求,毅然和几位同伴徒步奔赴延安。从此父子分别,再也没有见面。

杨公骥本来有着优裕的生活条件,用不着为吃穿而犯愁,且又年少聪颖,又有出国留学的条件,然而他舍弃了优裕,选择了艰苦;舍弃了荣华富贵的个人家庭,选择了出生入死的民族战场。他反叛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乃至社会传统,选择了一条历史必由之路,他奔赴延安完全出于自觉而不是“逼上梁山”。

1938年6月杨公骥入陕北公学,他第一次读到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以及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作出科学的预测,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以及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这是抗战以来,他看到的最系统最科学最明了的指导抗战的文章,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军事战略,使这个刚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由衷地钦佩。于是他开始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的著作,系统地读完了《资本论》。当时读《资本论》的不仅他一个,毛泽东听说后吃惊地说:“十七、八岁娃娃啃《资本论》!”1939年1月,杨公骥进入安吴青训班干部连,任学习干部。7月,他报名参加抗大,编入三大队,任大队宣传组副组长,准备开赴前线。一次急行军,本来病重的杨公骥一头栽倒,晕了过去,只好和十几位伤病员留在延川县拐峁第二兵站疗养所养病。12月出院,在延安七里铺兵站办理了出边区手续,准备返安吴。虽然带着国共双方认可的合法的通行证,但是这时蒋介石已暗中开始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经洛川时被国民党“非法”扣押,秘密押解到西安十余天。杨公骥以抗日学生的身份,机智地骗过了国民党特务。年末获释,返回安吴,立即将被扣详情全部报告组织。1940年2月,中央组织部调他回延

^① 杨公骥:《自传及著作简述》,《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2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页。

安,谈话后,将他转给中央敌工部领导,分配他到鲁艺学习。实际上,当时康生所领导的保卫部门已把他当做嫌疑对象,在暗中审查。他发现后,很委屈、也很不满。由于少年时娇生惯养,任性使气,受不得委屈,于是常与领导争辩。在一次批判会上,竟和校领导周扬吵起来,周扬就勒令他退学。20世纪50年代末,周扬特意找到杨公骥,说:“我们办了鲁艺八年之间,就开除了一个学生就是你,也只培养出一个青年教授,而且是国家二级教授,也就是你。可见人在认识一切事物之中,认识人是最困难的。”1941年4月,杨公骥调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兼任文化教员。1943年4月,被羁押在边区保安处受审查,同受审查的还有吴波(解放后曾任中央财政部部长)等同志,审查一直持续到1945年冬。

从1938年6月进入陕西新正县看花宫乡的陕北公学校分校,到1945年冬离开延安开赴张家口,杨公骥在陕甘宁边区共生活了七年半,这段时间,是他最宝贵的青春期,他做过青年工作,当过文化教员,开过荒,种过地,纺过线,做过木匠活,还长时期的被关押。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读书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这期间,他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如他通读了《资本论》后,联系他所具有的各学科知识和各种社会实践知识,逐渐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前者是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现实经济条件出发,是以客观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后者却是从“正义感”、“合理愿望”等主观意志出发,以观念为基础的。有了这个分辨力,就能客观地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否则,就会用传统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来篡改马克思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曲解成平均主义的甚至是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正是由于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使他的思想得到了升华,获得了以后从事治学的强大“精神生产力”。

二 独树一帜的文学家

1947年杨公骥担任东北大学国文科副主任,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深感当时流行的教材不适于培养新式学员的需求,他于是开始了新的《中国文学史》的构思与初稿撰写。中国人编写自己国家的文学史,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的,到全国解放前夕,林林总总已经有了许多版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较有影响的有: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然而最早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系统地研究中国文学发展过程,还当数杨公骥。1951年草成第三稿,因其新颖独特的体例与论述,受到中央教育部的重视与表扬,中央教育部组织专家评审后,认为该著作的特点是:“广泛地掌握资料,有创见,并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处理中国文学史上的某些问题。”1951年12月9日下发《通知》,将之“介绍推广给各院校”。尽管如此,杨公骥仍不急于将第三稿公开出版。后来又受中央教育部委托,参与了建国后第一部部颁《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制定工作。到了1957年,才将第七稿付梓,名为《中国文学》(第一分册),被国家指定为向国外推荐书。以后多次再版,成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经典著作之一。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重读这部书,仍感到当年中央教育部《通知》中所归纳的那些特点,是那么的准确而有针对性,和现在的各种文学史相比,这些特点仍十分地鲜明、突出。

该书第一编为《中国原始文学》,将“中国原始文学”立为专编,本身就是中国文学史编纂体例的创新之举。在此之前的文学史著作都无“原始文学”专章,为什么大家对原始

文学讳言之?一是关于原始文学的文献资料特别少。二是关于中国原始文学形成与发展的论述难度大。三是受到疑古思潮的严重影响,怀疑古文经典,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托古改制而作,黄帝、尧、舜、禹皆非史实,既如此,还凭什么来谈论原始文学?杨公骥独能拨开疑古的重重迷雾,来探讨中国文学的最初源头与中国文学的“原初遗传基因”,弄清中国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表现出非凡的学术胆识,究其根本,是马克思主义给了他“慧心”、“慧眼”。

《中国原始文学》共分三章,第一章为《劳动产生文学》。关于文学是怎样产生的,有种种主张,诸如“文学源于游戏”、“文学源于巫术”、“文学源于人类情感本能”等,杨公骥根据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文学的实际,论述了“劳动产生文学”的这一命题,再一次以中国文学的实例证明劳动才产生“游戏”、“巫术”、“情感本能”,赋予语言表述,表现为一定形式的文学,文学是由劳动所派生并和劳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中国原始诗歌大多是二拍子节奏,这是因为劳动时一反一复的动作派生了诗歌的节奏和韵律。二拍子的诗歌节奏不仅适应劳动动作,还可以反作用于劳动的节奏。二拍子节奏的诗,比较短促,它要求句子简练,语言明确,这种诗的语言与平常讲话有所不同,它进一步促进了人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劳动不仅决定着诗(亦即文学)的内容的形成,而且决定着诗(亦即文学)的节奏、韵律等形式的形成。文学源于劳动,音乐、舞蹈亦如此,音乐是仿效劳动音响而形成的,就连打击乐器也是由生产工具演变来的。舞蹈是仿效劳动动作而形成的,当人们以舞蹈再现劳动情景时,生产工具或生产产品(包括猎物、农作物等)便变成了舞具。原始社会,诗歌、音乐、舞蹈三者常结合在一起,不仅再现劳动过程,也表现劳动者的欲望,成为“游戏”、“巫术”的主要手段,这些原始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恰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很少有人能注意和论述到的。

本编第二章为《中国原始神话》,此前,一些文学史著作已将中国神话列专章来论述,那么,杨公骥在这方面有哪些新见呢?他联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关于幻想与现实关系的论述,强调:“神话虽然是幻想的,但它同样是基于实践,基于对自然和社会的感性认识。”“神话是现实的虚妄反映,……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他依据神话的产生与发展受社会实践所制约,受人的思维能力和认识能力所制约的原则,第一次排列出中国神话产生与发展顺序:“先出现自然神,后出现祖先神,最后出现宇宙大神”,将扑朔迷离的中国神话理出了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作者使用钩沉索隐辑佚之法,从现存全部先秦两汉文献中采撷出有关中国古代神话的零星片段,缀集成篇,辅以语译。从而整理出较为系统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神话的形成、发展与传统、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作出了若干精辟的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曾被一些神话研究者所采用。”^①本章通过对几则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原始神话的分析,显示了中国古代先民热爱劳动、重视发明创造以及英勇奋斗的精神,如在《鲧禹治水》中,“人并没有逃上‘方舟’,洪水也不是被上帝召回或自动撤退,而是被神化了的英雄,采用人的方式,从事工具劳动,经过艰苦的长年的劳动而‘治平’的。”再如《夸父逐日》,他认为:“夸父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当时客观上水不足。他不是懒死的,是在追求水(知识和真理)的路途上渴死的。夸父英雄的悲剧结局,正是我们伟大的先人对自己的写

^① 李颖:《杨公骥文集》,《文艺研究》2000年第1期。

照。”这一观点,受到许多人的赞同。甚至有人说,中国举办奥运会,其开幕式上点燃火炬的形式,寓有深意,受到了杨公骥对《夸父逐日》精辟分析的启发。这一章所论多为前人所未发,阐明了中国原始神话对先民精神本质的真实写照,揭示了中国原始神话区别于其他民族神话的独特的民族特点。

本编第三章为《周族原始祭歌》,作者认为最初的祭歌,是由原始劳动诗歌改变成的。作者运用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基本观点,客观、历史地分析带有宗教祭祀色彩的原始祭歌和咒语具有两重性:既表示了人们对自然威力的畏惧和献媚,又表示了人们企图控制自然的欲望,祭歌和咒语也有其积极的社会作用 and 意义,这与那些把祭歌和咒语一律斥为“迷信糟粕”的学者是不同的。本章又对祭社稷的祭歌《载芣》与《良耜》、祭祖先神的祭歌《生民》、英雄祖先颂歌《公刘》与《绵》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周民族的祭歌,大多产生于三千多年以前,时周人还处于氏族公社的时代。作者主要采用了“自证法”,即根据诗自身的形象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来证明诗歌产生的时代,这与仅通过诗中一、二个字의 考据或依据后人附加的诗说来判断诗作年代,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一改这些诗全是西周早年迄于春秋中叶的传统陈说。作者比较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既不强作“新异”,又不徒发空论,而是以丰富的文献资料与严谨的考据,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为了阅读方便,作者把大量的资料性、考据性的论据、论证排在每个章节后的注释中,许多注释实际就是考据性论文的缩写,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体例。

1950年3月东北大学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杨公骥编入师大中文系,当时中文系有四大名教授:杨公骥、蒋锡金、穆木天、张毕来。杨公骥除给本科学生授课外,还在不断地改写着讲义中的其它编。杨公骥曾在黄河边参加过战斗,他体验了置生死于度外的战斗生活,现在他要以在前线作战的姿态来完成讲义的写作。白天忙于教学,写作只好集中在夜里进行。东北的数九寒冬,滴水成冰,他披着一件羊皮大衣在冰冷的办公室里经常一宿一宿地熬夜书写,手冻僵了,搓一搓,用嘴里的热气呵一呵;水笔结冰了,贴到怀里温一温。困了,倦了,就猛吸关东烟、干喝烈性酒来提神,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多年。

该书第二编是《殷商奴隶制社会 and 文学》。论述殷商时代的社会、宗教、神话传说、音乐、舞蹈、祭歌颂歌、书诰散文以及甲骨卜辞 and 铜器铭文等,这种从文化综合的角度研究殷商文学,是已往一般文学史所未采取的。作者除搜集常见的文献外,还曾遍查各名家对殷墟甲骨文的考释,并从《殷墟文字》乙编的影印拓片中寻求到有关史料,对殷商时代的神话传说进行整理并加以阐述,指出了殷商神话传说所反映的殷商社会丰富多彩的历史生活及它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对殷商时代舞蹈 and 祭歌颂歌的研究,重点放在对祭歌颂歌的系统分析上,得出了极富启发性的剖析与首创性的结论。如认为《诗经》中的诗,有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不是社会上一般认为只是西周到春秋中叶的作品。为了证实这一点,特作《商颂考》附于书后。认为《商颂》是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所作,几乎成为近世《诗经》研究中的一种定论。但这种“定论”并不确凿,持这一观点的人只能列举某些似是而非的疑点。杨公骥对这些疑点一一给予澄清,并根据可信史料对疑点逐个作了有力地辩驳,证实《商颂》是商代的诗歌。赵敏俐教授称这篇《商颂考》“思维严谨,资料丰富,条理清晰,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经过了三四十年之后终于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我以为这

是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经典性论文之一,也最能显示先生追求真理的精神。”^①

该书第三编为《西周和春秋时代的文学》。本编以《诗经》为研究重点,首先确定那些诗歌属于西周和春秋时代的作品,再从这一历史时代的封建社会特征和封建礼教特征入手,考察其诗歌的结集、分类、断年和四家诗说的的问题。进而分析西周和春秋时代诗歌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及社会生活,以及表现这些内容所采用的语言样式、表现手法与艺术价值等问题。这实际上已经开启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结合周代社会礼乐文化来研究《诗经》的先河。《诗经》中的“雅诗”,自五四以来便被视为“庙堂文学”或“剥削阶级的反动腐朽文学”,因而“雅诗”的研究一直受到轻视或忽视。作者一反流行已久的“左”的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及这些观点在研究中的机械套用所产生的偏见,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雅诗”本身的艺术价值,对“雅诗”的艺术成就与历史意义做了实事求是、全新的评价。

该书第四编为《战国时代的文学》。设专章介绍儒家的“礼乐观”,并将《乐记》作为我国最早的“美学理论的萌芽”加以具体分析和深刻阐述。在“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两章中,从艺术的角度,在“子书”、“史书”中开拓文学史的意义,并据此揭示其对后世文学的奠基意义。“关于古代寓言,已往大多把它当作论说文的比喻性例证或散文中的小故事来看待,并不作专门研究。但杨师则将它视为一种特殊样式的文学,所以开设‘战国寓言文学’专章来研究,详论寓言文学的起源、演变、文体特征、表现手法和语言形式的特殊性,并说明它和哲学、逻辑学、政论的关系及其社会功用。这是已往一般文学史所没有的。”^②

战国时期的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这已经成为“定评”。但杨公骥认为:这是在用“极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观点来评价屈原,因为“七国并峙只不过是我国内部一定历史阶段的封建诸侯的割据状态而已。历史证明,七国的人民都是以后构成我国民族的来源,七国的领土都是以后我国民族的生存领域。战国时人民虽然处于不同的诸侯统治下,但在经济生活上、社会伦理上、语言文字上、文化传统上、心理素质上彼此基本是相同的。先秦时的诸子百家著作和屈原的作品都证实着这点。因此不能把战国时诸侯的封‘国’当作今天意义上的‘国家’来看待,诸侯间的战争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如果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那么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吴起、商鞅、韩非等,岂不都成了“不爱祖国甚至出卖祖国”而各处奔走的“国际浪人”?后人出于对屈原的偏爱,本意是为了说明屈原在历史和政治上的重要性,结果却证实了骗子张仪、傻瓜楚怀王、内奸上官大夫及妒妇郑袖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实践而不是个别人的意志。屈原之所以伟大,“并不是由于他忠于怀王,拥护湖北破落领主打陕西新兴地主”。而是他嫉恶如仇,揭露统治者的腐败,歌颂正直、善良、廉洁、耿介,恰好反映了人民的性格和反抗精神。杨公骥为此特别写了一篇《楚的神话、历史、社会性质和屈原生平》,附于书后。三十年之后有人抄袭此文,作为自己的“创见”来发表,也说明了杨公骥关于屈原和楚辞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

^① 赵敏俐:《独具个性 执着求真——杨公骥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② 李炳海:《杨公骥教授学术贡献概述》,《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

《中国文学》(第一分册)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其最大的创新就是在中国文学史编写的历史上,最早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系统地研究中国文学发展过程及探求其发展规律。刘跃进教授曾著文指出:“杨公骥先生的《中国文学》第一册的问世,基本上划定了以后 40 年间先秦文学史研究的范围,其众多观点,也成为先秦文学史研究的基调。徐北文《先秦文学史》……等,大体上就是依据着杨著的规模和观念加以铺陈推新。”^①

早在 1948 年,杨公骥就对汉代杂舞歌辞给予了关注,认定这是汉代文学的新样式,是中国“戏剧的雏形”。但杂舞歌辞因为声辞杂写,自东晋以来 1600 多年没有人能够解读。1950 年 7 月 19 日在《光明日报》第 3 版上,发表了杨公骥的一篇在学术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文章——《汉巾舞歌辞句读及研究》。汉巾舞歌辞是指汉代巾舞《公莫舞》的歌辞,或称《公莫巾舞》歌辞,属汉代杂舞歌辞的一种。汉代杂舞歌辞留存于世的只有两篇,另一篇则为铎舞歌辞《圣人制礼乐》。杨公骥根据古辞往往声辞杂写的前例,将其中的声辞分开,又考虑到它的舞曲特征,怀疑其中杂有动作的记号,所以在标点时曾留心其中动词的位置和相互关联,再用内证法和历史相关记载,对这篇作品进行句逗和考释,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公莫舞》歌辞的本辞。并对巾舞的内容、和声、舞蹈动作及其创制的年代和流行的地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第一次实质性地破解了这一千年难解之谜,让中国现存最早的歌舞剧的真实面貌基本呈现在当今人们的面前,不仅为破解铎舞歌辞《圣人制礼乐》提供了途径与方法,而且更为研究汉代诗歌乃至中国戏曲史、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一份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这篇文章发表 40 多年后,其巨大的学术价值,逐渐被人重视。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到目前,学术界就这一课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文章,甚至还引起激烈的争论,其研究都围绕着杨公骥的研究而深入展开,体现了杨公骥《公莫舞》研究的深远影响。

1962 年,杨公骥出版了《唐代民歌考释与变文考论》一书,本书分二大部分,一是从《敦煌琐瑣》中选出 28 首唐代的“五言白话诗”,即唐代的敦煌民歌,以大量的唐代文献来对其进行考证与注释,体现了他一贯主张杀鸡要用宰牛刀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对文献上记载的每一个社会现象,乃至每一个词语,都要从产生它的社会物质生活中及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找依据,都要用有关当时社会的典章礼法、社会制度、经济关系、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大量资料来加以阐释,决不只停留在就事论事的表面现象的解释上,或仅仅作语言学方面的释义。这一考证与注释特点,成为敦煌文献乃至其它古代文献考证与注释的范例。

本书另一部分是对敦煌文献中的“变文”进行考辨论证。在此之前,各种旧说对变文作了错误的解释,如胡适及一些著名学者认为变文源自印度佛教,是佛教徒唱呗之法输入之后,把佛教经文敷衍成通俗的唱本,从而形成一种说唱文体。这一文体对后世中国文学影响极大,乃至决定了唐代及唐以后的文学变迁大势。杨公骥从考论“变相”、“变”、“变文”开始,认定所谓“变相”是指“变化形象的图像”,简称“变”,是佛教壁画或画卷的一种俗称。这种壁画或画卷用了特殊的颜料,某一部分能在夜间闪光;或因气候、光线甚至观看角度的变化,使所绘的相(形象)也随着发生某些变化。所谓变文,就是变(壁画、画卷)

^① 刘跃进:《徘徊与突破——20 世纪先唐文学史论著概观》,《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 年第 2 期。

的解说文,基本题材都是取自壁画、画卷故事。变文利用了中国传统的传、赞样式,由散文和韵文组合而成说唱形式。变(图画)与变文相结合而组成图文合解,是对我国传统的“图”、“传”、“赞”样式的继承。这不仅仅是考论几个名词的概念,也不仅仅是考辩变文这一文体产生的渊源,还涉及到中国后世话本小说、弹词、戏剧、甚至民间文学和口头文学的源头,以及中外文学发展交流等重要的文学史问题。它对人们认识中国多种文体的形成、运用、演变,以及对认识中外文化交流的形态等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而对我国的敦煌学,特别是敦煌文学研究有着特殊贡献,成为敦煌学中研究敦煌文学的一部标志性著作。

继《中国文学》(第一分册)之后,杨公骥开始撰写第二分册,即汉代文学,至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基本完稿。没想到一夜之间,被抄家,图书散失五千多册,所有的讲稿和几十年积累抄制的十万多张资料卡片及《中国文学》(第二分册)全部被毁或丢失。新时期以来,随着学术的正常化和思想的逐步解放,杨公骥决定重新写一部先秦两汉文学史,这部文学史要突出先秦两汉文学文化综合形态的特点,在文学与总体文化构型之间存在着互涵互动的关系的前提下,认识文学受文化建构整个过程的驱动,同时自身又以审美方式而参与文化建构,并在整体文化建构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从而对先秦两汉文学作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这就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建构的“大文学史观”的核心观念。后来,杨公骥以《先秦两汉大文学史》、《先秦两汉大文学辞典》为题,申报了两项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立项后,用了二三年的时间,制定了编写大纲,列出了各编的章节目录,确定了编写成员,进行了具体分工。就在进行具体编写中,项目主持人杨公骥不幸于1989年6月辞世,这一重大的课题就搁置了起来。杨公骥准备搞出代表时代水平的《先秦两汉大文学史》,他仍像过去一样长久地精密构思,不肯轻易动笔。不想,事难遂愿,杨公骥带着深深的遗憾走了。

三 成绩卓著的史学家

1948年7月,东北大学从佳木斯迁到解放了的吉林市,时任文学教研室与中国史教研室主任的杨公骥,打听到市郊西团山零散着一些不知年代的石棺、石器。经过考察,他认为很有发掘研究的意义。立即组织当时历史系的教师、学生在课余从事初步发掘。经过二个月的发掘,三个月的小型踏查,由杨公骥撰写出《西团山史前文化遗址初步发掘报告》,并将报告送交《东北日报》一份拟公开发表。郭沫若先生于1949年1月25日在致《东北日报》主编的信中写道:“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学术性文字……方法正确,态度严谨,叙述详实,见解审慎,很能实事求是。……关于陶鬲陶鼎之普遍出现似应特别重视。旧时人习视关外为化外,日寇更有意特殊化,把各种出土物隐匿歪曲,我们现在应该尽力根据地底事实打破这些观点,应强调关内关外在史前就是一家。建立这种新史观,我们是有充分根据的。”这次考古发掘,不仅发现了一个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还从考古学的意义上说明了东北地区与黄河流域自古就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圈,批驳了日本侵略者关于东北文化与中原文化不同的谎言,因而具有特殊的现实政治意义。正因为如此,西团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也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视。杨公骥所写的《报告》,很快就在苏联与日本的报纸上进行了转译。1949年冬,中央政府又指派裴文中、贾兰坡、李文信与杨公骥等人组成西团山考古队,从事第二次发掘,西团山文

化被视为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同样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文化,在中国原始社会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开了共和国考古发掘工作的先声。在西团山文化的发现及确立过程中,杨公骥有着筚路蓝缕的初创之功。

1958年,西藏的民族分裂分子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暗地串联,公开滋事,磨刀霍霍(第二年的三月便发生了西藏武装叛乱)。帝国主义总想把西藏变成他们可以奴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大肆鼓噪所谓的“西藏独立”,其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一向被西方视为西藏研究的权威性著作,英国人查利·伯尔写的《西藏史》和《西藏之生活》二书。这二本鼓吹民族分裂的书,其论据是虚假的,其结论是荒谬的,其目的是险恶的。杨公骥清晰地洞察到当时国内外这种严重的动向,于是在1958年,决定针对查利·伯尔的二书,写一部《西藏古史、古地、古俗考》,用历史事实戳穿帝国主义分子散布的民族分裂的谎言,捍卫祖国的统一与各民族的大团结。但在写作中经常闹病,未能完成《西藏古地考》与《西藏古俗考》,只完成了长约五万字的《西藏古史考》,然而就是这篇《西藏古史考》,把藏族从中国古羌族到唐代吐蕃族的民族产生与发展脉络做了十分清楚的梳理,批驳了查理·伯尔根据一个佛教故事,把西藏人说成是观世音菩萨“破戒”后所生的哲嗣,是印度菩萨的旁支子孙的谬论,揭露他企图用宗教代替西藏历史,进而切断藏民族与汉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血脉关系,否认藏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成员的险恶用心,这篇文章,用大量的不可争辩的历史证据,科学地说明了藏族的民族来源,说明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之大不言而喻。甚至时隔50年后,郭杰教授还著文说“今春发生在拉萨街头的“藏独”骚乱事件,再次让人们将目光投向西藏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去深思那里发生的一切及其深层根源,以及西方世界在此问题上怀有的傲慢与偏见。在这个意义上,重读杨著《西藏古史考》,有助于消除误解、廓清事实,自然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①

1980年,杨公骥发表了四万多字的《考论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居民“冬窟夏庐”的生活方式及风俗》。文中通过详细的考证,介绍了《诗经》、《周易》、《礼记》等诸多古文献中所记述的古人“陶复陶穴”的结构样式。所谓“陶复陶穴”,是指如两个陶碗相扣在一起形状的住室,下半陷于地表,上半隆起地表之上,留有出入与通风透光处。所谓“冬窟夏庐”,就是指冬天住入这种半地下的地窟,夏天因生产需要,住在田间简易的“屋庐”,俗称“窝棚”。文章指出:这种半地下式的地窟,不仅见于古史记载,而且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北、西藏等地区都有遗址发现,直到19世纪末,在吉林、西伯利亚东北部某些民族中,仍是其住室的基本形式。在黄河流域河北磁山发现的这种地窟,经过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6005—5794年。由此证明,早在8000年前的古代,黄河流域人与东北亚(及阿拉斯加)人便在文化上和生活方式上有着共同性。黄河流域石器时代的工具,与东北亚地区出土的工具一模一样,证明远东地区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又从宗教学和民俗学的角度,对东北亚地区居民与黄河流域居民的宗教、祭礼、仪式、风俗,甚至各种民间节日,作了精细的比较研究,发现了两者之间有着极其明显的共同性,说明从远古到近代,黄河流域与东北亚地区之间存在着文化

^① 郭杰:《一部不该被遗忘的著作——重读杨公骥先生〈西藏古史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4期。

联系与交流。这篇论文以资料多、证据足、论断谨严、见解独到,受到历史考古界的重视,在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史、民俗史、文化史、地区史、疆域史等多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1981年至1982年,杨公骥发表了长文《评郭沫若先生的〈奴隶制时代〉》。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被许多人当作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最有权威的著作来看待,书中的“周代奴隶制说”,被视为权威性的定论。杨公骥十分尊重郭沫若,但他更尊重历史,更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他的批评文章采用了对照的方法,即将郭沫若的主张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及中国古代史的实际作比较,从理论与实际上来辨析《奴隶制时代》中的错误观点。如郭沫若在其书中说:“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和封建农奴的区别,往往不很显著”,“看不出有多么大的区别”。但马克思在《资本论》、《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等著述中,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等著述中,却认为奴隶和农奴不仅有区别,而且区别是明显的,其区别就在于他们在提供无偿劳动方式上有显著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奴隶社会,奴隶为奴隶主所占有,其全部劳动形式上统统表现为无偿劳动,即使那部分有偿劳动(即为支付奴隶必需生活资料而令奴隶从事的那部分劳动),看起来也像是无偿的,是在貌似无偿中掩盖着有偿。在封建社会,农奴不为领主所占有但从属于领主,农奴为了在领主分给他的土地上进行有偿劳动,就必须在领主的土地上进行无偿劳动,有偿与无偿分得一清二梦。(领主剥削农奴劳役地租,地主剥削农民实物地租,略有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既不为资本家所占有,也不从属于资本家,工人只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出卖给资本家,工人的全部劳动形式上统统表现为有偿劳动,即使那部分无偿劳动(即那部分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看起来也像是有偿的,是在貌似有偿中掩盖着无偿。以不同的占有无偿劳动的方式来判断不同社会的生产关系,确定不同的社会形态,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郭沫若忽视了这条基本原则,当然看不出奴隶和农奴的显著区别,也就轻率地把周代的农奴视为奴隶。郭沫若在其书中对周代“奴隶”的特征进行了多方面的描述:他们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占有一小片土地、独立经营他们的农业;他们有家室有家业(财产),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的“耕作”有一定的“定额”,奴隶主对他们的剥削有一定的“定量”,其劳动收获按规定双方共同“分成”;他们还能参与社会借贷关系,成为债务人;他们还能从事商品生产与商业贸易,既是商品的购买者,又是商品的贩卖者,等等。这些特征,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都有叙述,但不是奴隶的特征而是封建农奴的特征。

郭沫若使用了一些并不能从本质上区分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标准”,诸如“杀殉”还是“不杀殉”;“杀人祭祀”还是“不杀人祭祀”;“可以任意屠杀”还是“不可以任意屠杀”等等,杨公骥查遍马克思、恩格斯所有著作,发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没有把“杀殉”之类的社会现象当作划分社会性质的标准,甚至连暗示的话也没说过,因为决定社会性质的只能是社会经济制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杨公骥又遍阅中国古代文献史籍,其上记载杀殉的对象多是死者的亲信或随从,有的还是死者的妻妾与宠臣,这种杀殉的现象直到宋、明时期还存在,至于买卖人口的现象,到近代仍未断绝,我们总不能据此把宋、明乃至近代也称之为“奴隶社会”吧!杨公骥以大量的中国古代史实,又一次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区分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理论的正确性,证实了西周是封建社会,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古代史的深入研究。

四 诲人不倦的教育家

几十年来,杨公骥先生以超乎常人的勤勉教书育人,由于他广览博识,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也是多方面的。在东北大学任教授时,讲授的课程就有:文章选读、中国文学史、国学概论、语言文字学概论、社会发展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经济、“五四”思潮等。20世纪50年代他给中国文学讲习所青年作家讲课,听讲的有邓友梅、玛拉沁夫、张志民、流沙河等人,专题课是《水浒传》研究,专业课是中国小说史,为此他还著有《中国小说史》。中文系1957级的隗芾男,毕业后入东北文史研究所学习,他回忆说:当时他从杨公骥先生学的是《文心雕龙》。改革开放后,他应邀各地讲学,都是征求听众需要而决定演讲的内容,80年代还为中央电视大学主编过教材《中国文学》。杨公骥指导学生,往往不限于先秦两汉文学,内容涉及民俗学、古文字学、历史学、敦煌学等,做到了跨学科、大文化式的融汇贯通。

从1952年担任国家研究生导师以来,先后共培养了19名研究生,5名硕士研究生,8名博士研究生。他指导研究生,反复强调文学不是独立存在或孤立发展的,而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研究古代文学必须相联系地研究古代的各种意识形态,不可单抠一门。因此他要求研究生兼学与专业相邻或相关的历史、哲学等其他学科,给专业的深入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就是主攻先秦两汉文学,也要通晓整个中国古代文学,还要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古代及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与现当代的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对后者不通晓,对前者难精通。中国与外国的文学,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特点,没有比较就不会认识中国文学的本质及特色。治学需融会贯通,如果知识贫乏则无法实现,只有博大才能精深。

杨公骥尊重研究生的自主选题,因此研究生论文选题很广泛,有的还突破了先秦两汉文学的方向。不论什么选题,杨公骥都能给予有效的指导。为了指导好每一位研究生的论文写作,他宁肯自己少写文章,每年都要反复审阅研究生论文达百万字,而为了指导好这些学位论文,他每年阅览的参考文献甚至比研究生本人还多,总数字往往超过千万,对论文的批语(包括研究生所作的口述记录)也有十几万字,他的研究生戏说自己的导师每年施行的是“十、百、千”工程。他培养的研究生学术视野开阔,文、史、哲的基础宽厚,他们研读勤奋、学养丰厚、研究领域广阔、钻研精深、观点新颖,都与杨公骥的指导有关。

如张碧波,是杨公骥指导的1954级研究生,从1960年开始发表论文,著有《中国文学史论》等多部专著。70年代末期,在《文学遗产》上连续发表多篇从宏观角度研究古典文学的理论文章,与时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伯海相呼应,被当时的学人称为“南陈北张”。1986年张碧波开始主持国家社科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1997年以后,又转入对中国东北民族与疆域问题的研究,出版了《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东北民族与疆域论稿》,成为黑龙江省著名的文化名人。

苗壮是杨公骥1964级研究生,其兴趣在中国古代小说,杨公骥对中国小说的许多重要观点使苗壮受益终身。苗壮也尤以中国小说研究成绩卓著。著有《才子佳人小说史话》、《稗海览珍》、《中国笔记小说史》等。

张弘是杨公骥1978级硕士研究生,他的兴趣在外国文学、中外文学比较上。杨公骥并没有让张弘转系转导师,也没有让张弘改变研究方向,而是在他的研究兴趣上给予指

导,显示出杨公骥雄厚的外国文学的功力。张弘后来成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在英国》等。

李炳海,杨公骥第一届博士研究生。1991年被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3年起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李炳海在杨公骥身边有十多年,他得到杨公骥先生的指教最多,治学也有许多地方与杨公骥相同,即博大精深,文、史、哲互相融会贯通。著有《道家与道家文学》等。参加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材《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任秦汉卷主编。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著述多次获得了省、部(教育部)级颁发的优秀学术成果奖,在先秦两汉文学研究领域,居于国内领先地位。

赵敏俐,是杨公骥1984级博士研究生,1993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2000年起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出版过《两汉诗歌研究》等,先后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奖、省、部(教育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达10余项。

杨公骥指导过的研究生,后来都成为高校教学与科研的骨干,把这些研究生的教学、科研作一统计分析,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扎实,社会人文知识面宽,多学科融会贯通,胜任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博与专结合得好,科研成果社会价值高。这些特点当然与他们本人几十年来的勤奋钻研、努力实践紧密相关。但在他们读研究生期间,杨公骥导师的正确指导,对他们这些特点的形成,也起了关键的作用。

1982年5月,教育部要求杨公骥总结30年培养研究生的经验,他写成这份经验总结后,《社会科学战线》将此总结在该刊1983年第1期上发表,改题目为:《与青年同志谈如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其中写道:“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不仅要博览群籍,而且要用自己的精神生产的能力(即分析、概括、推理、判断的思维能力)从古代遗留下来的材料中再生产出精神财富来。他们是社会主义科学工作者,是精神文明的生产者,不是如一些人贬斥行时所说的那样,是‘劫墓贼’,是靠记诵古人家谱、推售‘旧货’为生的人。因此,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生说来,读书(精读文献、发掘材料)是重要的,但哲学的思维能力(精神生产的能力)必须在研究实践中不断提高,这却是更为重要的事。从事精神生产的研究工作,而精神生产的研究能力不足,从来是科学研究工作者不可代偿的致命缺陷。”为此,他一直强调研究生必须努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是必修课,也是常修课。

杨公骥一生执着地追求真理,后来长期从事教学与科研,其追求具体化为做学问。他常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巨大的思想和道德力量作为动力,是不可能不屈不挠、持久不懈地埋头研究数十年的。一个研究者如果以兴趣为动力,则兴趣是容易改变的;如果以名利为动力,则名成利得之后,他的研究工作就会停步。一个人如果献身学术,那就会终生为之追求,遇到再大的困难挫折也不会后悔退缩。杨公骥几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生涯,就是不倦怠的追求过程,杨公骥先生用他的一生,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作者通讯地址:杨树增 广州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510006)

(责任编辑 晓 思)